认为断无此事，以至许多史著出现一个空白。但是传说各本都一致说有此事：《三本》说“后来老汗王又伺候了李总兵”；《岫本》说“明朝镇守辽阳的总兵李成梁，经常操练人马，小憨子就天天不离地方观看”、“以后小憨子就天天服侍李老爷”；《新本》说“一个丧父失母的孤儿，流落到明朝总兵李成梁府中当郭什阿”。这显然印证了明朝人的有关记载。

问题在“郭什阿”与质子身份矛盾否？回答是不矛盾。史载春秋时越王勾践沦为吴王夫差的人质，身亲贱役，倍尝艰辛。努尔哈齐作人质时要“伺候”“服侍”人当“郭什阿”⑫，似乎是不成问题的。从“郭什阿”的满语含义看，有“近侍、亲军、勤务兵”的说法，则明人有关记载得到进一步证实。

努尔哈齐的祖父觉昌安亦当过李成梁的人质，那是万历二年建州首领王杲诱杀明官吏裴成祖、攻击清河、抚顺为明军击败逃窜之时，李成梁“以市夷头目叫场（即觉昌安）等为质，遣其属物色杲”⑬。后王杲为海西女真首领王台所获，努尔哈齐之祖、掌管贸易的头目觉昌安才改变其做人质的境遇。这当然也是努尔哈齐为李成梁质子的有力佐证。努尔哈齐、速尔哈齐为质子到李成梁标下，当然是在其祖觉昌安为人质之后，其父塔克世为李成梁效力之时。

因为满族关于努尔哈齐逃难的民间传说产生在公然对明用兵之后，所以李成梁如何“厚待之”就不便提起了。努尔哈齐做人质时如何从伺候人的地位成为训练有素“每战必先登，屡立功”的武士，当然也不该在传说中出现。同样，努尔哈齐兄弟被明朝任官授职、步步高升、势力不断扩大，以至同李成梁结成儿女亲家⑭，以及送子巴布海为明质子等等，在清代官书和民间传说都不提及。

但事实毕竟是难以完全抹煞的，民间传说各本中对努尔哈齐与李成梁关系的叙述，与明代、清初有关记载互相契合，补正了清代官书之不足，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

---

① 参见莫东寅：《满族史论丛》201页，认为民间传说努尔哈齐“曾为质于明将李成梁”不可信，否定孟森先生的肯定看法。

② 程令名：《东夷奴儿哈赤考》，载《筹辽硕画》卷首。

③⑤⑪黄道周：《博物汇典》，《建夷考》。

④⑦⑧《山中闻见录》卷一。

⑥ 参见拙作《努尔哈齐曾为明朝质子考》，《社会科学辑刊》1979年5期。

⑨ 《剌失丁德集史忽必烈汗纪译释》（上）、《清华学报》第14卷第1期，转引自贾敬颜：《纠军问题刍议》载《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0年1期。

⑩ 王在晋之《三朝辽事实录》卷一有努尔哈齐在其父被杀后“请死”的记载，《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一有努尔哈齐质问明朝“祖父无罪，何故杀之”的记载。

⑫ Gocika，近侍、亲军、勤务兵，载《清文鉴》卷八，兵类。当包含质子军。

⑬ 姚希孟：《建夷援官始末》，载《明经世文编》卷501。

⑭ 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一载李成梁子李如柏娶努尔哈齐侄女、速尔哈齐之女为妾，生有儿子。

雍乾时期北方边境贸易新城——买卖城

许淑明

1722年，雍正帝即位。他在位十三年，为维护国家的统一和边界的安宁作出了努力。1724年，雍正帝派皇兄鄂伦岱和理藩院侍郎特古忒到色楞格斯克附近会晤俄国领事郎克，商讨中俄双方划定在蒙古地区的边界问题，并且说明，俟边界划定之后，恢复两国贸易。

1725年，俄国政府委派萨瓦·务拉迪斯拉维奇为全权代表，率代表团来北京谈判。经过多次磋商，于1727年9月1日（雍正五年七月十三日），中俄两国代表签订了布连斯奇条约，于1727年11年2日（雍正五年九月七日）又签订了恰克图条约。这两个条约规定了中俄两国在蒙古地区的边界，此外，还规定开祖鲁海图、恰克图和尼布楚三处为中俄两国贸易地点。两国商人可以在上述地点建盖房屋围栅，互市贸易，规定去上述地点的路线和设官管理等事。中国政府并允许俄国政府每三年派一支商队来北京贸易，商队限定为二百人，饍食自理，买卖均不抽税。

中国政府通过上述条约，表明了对俄国的睦邻友好政策。苏联历史学家斯拉德科夫斯基也说："恰克图条约，对于俄国来说，是在贸易问题上作了重大让步"、"继承皇位的年轻皇帝雍正，执行了同俄国建立睦邻关系的较彻底的政策"①。

根据恰克图条约，1728年俄国政府在色楞格斯克附近，距特罗伊次科萨夫斯克要塞四俄里处建立了恰克图小城。在城内，为俄国商人建立了三十二所小木房，在恰克图中心建立了一所面积为十六俄丈的客栈，它有二十四个店铺，上层有仓库。恰克图城是中俄边界线上俄国方面的贸易城。

1728年5月25日，在中国商人的建议下，恰克图开市。当时，参加交易的只有十名俄国商人和四名中国商人。

清朝政府为了开展边境贸易，于1730年在恰克图对面，在中俄边界线上建立了一座新的贸易城——买卖城。

买卖城的建造者，是一些出生在中国北方省份的，特别是出生在北京的商人。他们原在库伦经商，后迁居至此。在买卖城定居的是一些单身汉，因为当时的法律不允许妇女去边界。买卖城的商人经常从内地带来一些十二至十四岁的男孩，让他们先在店里干几年杂活，学习经商知识，然后当店员。根据同店主订立的合同，学徒每三至四年回家乡探亲一次，在家乡结婚安家。买卖城建立之后，人口增加很快，到十八世纪七十年代，已有两百住户，四百多长住人口。

据当时去过买卖城的旅行家帕拉斯说，城成正方形，有三条由北向南的平行街道。城围以木墙，开有几处城门。城门上有塔楼，是晚间的护城哨所。1756年，在木城外围筑土墙②，加强防卫。

城里，有两座建筑宏伟的廊宇，一座在城中心，另一座在城南。这两座廊宇金碧辉煌，十分美丽。

买卖城的房屋不高于八点六公尺、平顶，上抹浅灰色粘土，门向街道。大门突出，饰以雕花柱子。屋檐色彩艳丽。住宅的内室有长炕，炕灶，炕边有三角架的炭火盆，上面放着沸腾着的水壶。

商店和住宅分开。商店的货柜上摆着各种货物样品。墙壁上挂着中国字画，室内有火炕和炭火盆。商店里整洁舒适，店主常常在这里接待俄国商人，签订贸易合同。

在院子里和街上，距离相等地挂着灯笼。每晚，店主把灯笼点亮。店门口通常挂着一束绸子，或纸和纸花，作为装饰。

买卖城外，单调的草原景色，城内，低矮的样式相同的房子和狭窄的街道，都给人留下不愉快的印象。但是，在十八世纪，就在这个偏僻的边境小城里，开始了中俄贸易。到十九世纪中叶，随着贸易的发展，买卖城和它的邻城恰克图，已经闻名于世界。

在贸易昌盛的年代里，买卖城生气蓬勃。据旅行家米奇说，当时，在买卖城，除华商和俄商之外，还遇到贩卖牲畜的蒙古人、西伯利亚农民、卡尔梅克人和布里亚特人。这些人都做买卖，酗酒作乐③。米奇所看到的这种沸腾的贸易情况，并不是立刻形成的。在米奇访问买卖城和恰克图之前数十年，即在十八世纪，在这里已经奠定了贸易的基础。

在买卖城，清朝政府派官员领导民政事务。清代人称他为昂邦，俄国人称他为扎尔固齐。在买卖城任职的昂邦三年轮换一次。据帕拉斯说，有些昂邦很能干。他们往往是满族官员。他们到买卖城任职，是因为“在别的地方犯了错误，被发配到这里来的”。这里十八世纪的情况，到了十九世纪，昂邦职位变得有利可图了，“在北京朝廷里，竟有人出钱买扎尔固齐的官职”④。这是因为买卖城的商人害怕这位地方官，送给他大量钱财礼物。帕拉斯说，在他访问买卖城时，昂邦有一定薪饷，但是，商人送给他的礼物，“大大超过了他的薪饷”⑤。所以，在十九世纪，昂邦的职位，是意味着“发财”。

昂邦管理买卖城的各种事务。他管辖雇佣的蒙古警察，分派捐税，管理贸易，进行审判。市民犯细小的过错便受到体刑——鞭笞。但是，有钱的人可以用钱赎刑。赎金则成为昂邦的主要财源之一。昂邦尽量寻找定罪理由去敲榨钱财。帕拉斯说，他在城市的街上，还看到一些醉酒闹事的犯人，他们都带着镣铐⑥。

对欠债人的处罚极严。昂邦将欠债人交给债主惩办，或施以体罚，即上夹板——用两块木板夹住欠债人的双脚或手指，上刑，直至骨头快断裂，双腿不能迈步为止。

违反贸易章程的人要受到惩罚。惩罚的方法很多，如暂时停止其贸易，责以棍打，发配服苦役，和处以死刑。

昂邦住在城南的一所住宅里。这所房子“宽敞，内部整洁，装饰豪华，此外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有几面旗子挂在大门口”，表示区别于其他住宅。昂邦在帽子上缝着水晶钮子，插着孔雀翎，以表示他的职务和身份。帕拉斯说：“中国人尊称他为昂邦，意思是边界总管，任何人向他请示事情，都不能站在他的面前，而是一条腿跪着，等候他的答复”⑦。

恰克图的俄国政权尽量同买卖城的昂邦保持友好关系。恰克图商人通常派代表去见新上任的昂邦，以俄国行政机关的名义赠送礼物给他。

买卖城是典型的商业城市。市民主要是商人和店员。此外，还有为数不多的手工业工人，如木匠、小炉匠、皮匠、理发匠等人。商人分成大商人和小商贩。大商人开店铺，小商贩零售日用杂品和食品。同恰克图的俄国商人进行贸易的不是小商贩，而是开店铺的大商人。但是，在边境贸易中许多小商贩很快就发了财，去经营大的买卖。俄国历史学家特鲁谢维奇说：“一个中国人，开始不过用五卢布做生意，卖食品。他不断扩大自己的买卖，过了几年，就有了一个店铺”⑧。

十八世纪，在买卖城，店员分为两批，一批人去恰克图同俄国商人做交易，另一批人则到内地采购畅销货物。这批人把货物运回，卖完之后，第一批人又去采购新货。后来，由于贸易的发展，购货和运输工作派专人办理。买卖城里只有人数不多的店员，多数人经常住在家乡。

商人将货物运往买卖城，一般是在九月下旬。运来的货物有食品、大米、茶叶、绸缎、布疋、糖、器皿等等。运输工具是牛车和两个木轮的大车。

从十一月起，喂牲口的草料用完，便改用骆驼运输。每支商队约有五十匹骆驼。商人并不把全部货物运往买卖城，大部分货物存放在库伦，在那里交纳货税，冬季才逐渐将货物运往买卖城。

中俄交易几乎整年在恰克图进行，是货物直接交换。在一定时期，双方规定一种货物作为标准商品（先是中国棉布，后是中国茶叶），其余商品都按标准品折算定价，然后进行交换。金、银也是商品，不是货币。

每年十二月至次年三月，贸易额增加。大宗交易是在二月份进行。二月，一般是中国的春节。大年初一，人们不做生意，不离开买卖城，相互拜年，玩耍。接着过“买卖节”。买卖城的商人认为这天是交好运的日子，因此尽量签订交易合同。在这天，买卖城的商人穿着节日长袍，去恰克图拜访熟识的俄国商人。午餐时，主客双方签订贸易合同。二月底，过灯节。灯节这天，恰克图的俄商清早就到买卖城拜访中国商人，深夜才离去。灯节夜晚，到处华灯高照。举行数小时的盛大庆祝活动。第二天，再开张贸易。

平常，中国商人到恰克图去换货，在恰克图交易所里，观看货物样品，往往就在这里签订贸易合同。有时，中国商人到俄国商人家中，边喝茶，边洽谈换货交易。谈妥之后，卖主和买主去到仓库，中国商人看过成色的货物之后，在货包上加盖印章，或由仓库贴上封条。然后，恰克图的俄商同买主一起去买卖城，在那里，俄商挑选所需货物，检查货物的质量，将挑选的货物放在一旁，留人看守⑨。

中国商人将换来的货物立刻送往库伦或张家口。这样做，是因为买卖城的每个店铺仓库都堆满了货物，没有空仓了。按照买卖城条约，在买卖城和在恰克图交易，商人免交关税。但是，在库伦和张家口，中国商人需要上货税。从北京或其他城市来的商人，在库伦或在张家口批发购买俄国货。买卖城的商人把卖剩的货物运往内地出售。

买卖城的商人组织得比较好。每天天刚黑，他们都从恰克图回到买卖城，在昂邦处开商务碰头会，经昂邦同意，规定货物价格，研究市场行情，商讨贸易对策。

清朝政府为迁居买卖城的商人规定了一个条件，即同俄国人接触，只许讲俄语，尽量不让俄国人学习汉语。所以，在十八世纪末，几乎所有买卖城的人都会讲俄语，而恰克图的俄商没有一个会讲中国话。当然，买卖城的华商讲的俄语并不很好，和俄商接触，久而久之，形成了一种特殊的“买卖城语言”。在整个边境贸易期间，中俄两国商人就是用这种语言进行交谈的。

随着中俄贸易的发展，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买卖城度过了繁荣时期，此后，逐渐衰落，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起，贸易缩小，许多小商人和手工业者外迁谋生。他们起初到俄国的特罗伊次科萨夫斯克城跑生意，后来在那里开辟了长期贸易点。随之，在外贝加尔也出现了从买卖城迁来的商人开设的小店铺。到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在外贝加尔西部的许多村庄里，都有中国人开的商店。

现在，谈一谈买卖城和恰克图市场在这一时期的贸易情况。

买卖城恰克图的贸易，在1756年以后才开始活跃，因为1756年，俄国政府停止派商队到北京，中俄贸易开始完全集中在边境。

到十八世纪末，在买卖城已有一百个商店，其中，三十七个是大商店。买卖城商人用绸缎、棉布、茶叶、大黄、烟草、生丝、冰糖、陶瓷器，甚至金、银去换取俄国商人的毛皮货和呢子。

中俄双方的贸易，是等价交换。因此，中国商人也收入了同等价值的毛皮和呢子。

在1768年以前，绸缎、棉布和大黄是主要交换品；1768年以后，茶叶成为主要交换品。根据俄国历史学家A·科尔萨克的统计，中国商人在恰克图市场上用绸缎和棉布换取俄国货物的情况（以卢布计）⑩是：

年　　代	绸　　缎	棉　　布
1758—1760	172933	509259
1778—1780	2111174	1063942
1790—1792	101617	1601263

十八世纪，买卖城和恰克图的贸易多次停止。据《高宗实录》记载，1762年（乾隆二十七年）初次停市，是因俄方增税引起。1768年（乾隆三十三年），清朝政府允俄国商务委员的呈请，开市。

1778年（乾隆四十三年）再次停市，是因俄国少校妄自尊大，有伤和气引起。1779年（乾隆四十四年），清政府允新任俄国少校所请，开市。

1784年（乾隆四十九年），因俄国卡伦兵持械进卡抢夺，俄国延不交犯，清政府于1785年（乾隆五十年）停止通商。1791年（乾隆五十六年），允俄国枢密院所请，准其通商。1792年（乾隆五十七年）开市⑪。

在停市期间，清朝政府对于违抗禁令，私通贸易的人处刑极严。关于这点，在《高宗实录》卷七四〇和卷七四九中都有详细记述。在1785至1792年停市期间，清政府谕令，严禁将大黄卖给俄国人，使得俄国政府失掉这种获利最多的专卖品。由于这次长达七年之久的停市，俄国政府失掉了大笔关税收入。所以，在1791年俄国枢密院发文给理藩院，请求开市。这封公文写得十分恭顺。公文说："……我国于天朝，素习恭顺。不敢稍存异念，所有以前未结各案，恳求早为剖断。至土尔扈特久已投诚大国，生聚有年，安居所得，岂敢冀其复还故土？想蒙大皇帝俯念忱悃，信其无他，干犯边界之说，实无其事。从前恰克图贸易经商，于俄罗斯大有裨益，敢乞施恩复准开市。"⑫乾隆皇帝见俄国来文言辞恭顺，便降旨复市。

买卖城和恰克图恢复贸易。1792年2月8日，中俄双方签订所谓的"国际议定书"协定，规定"今后不再发生违反恰克图条约之事，不准破坏和平协定。……至于两国商人，应由地方机关管理，交换之货物，应在限期内尽快换完，不得拖延，也不许欠债"⑬。这个协定对于两国商人起了一定的约束作用。

根据A·科尔萨克统计，在1792年恰克图复市以后，中俄贸易增长情况如下：

年　　代	中、俄双方各交换的货物（以一千卢布计）	总　　计
1792	2467	4934
1793	3549	7099
1794	2523	5046
1795	2702	5404
1796	2552	5104
1797	2379	4758
1798	2784	5568
1799	3678	7356
1800	4192	8384

据科尔萨克统计，在恰克图复市以后的九年中，俄国政府从恰克图运入俄国的货物课征的关税，增加了二十一万卢布，即从1792年的五十万九千八百三十卢布增加到1800年的七十万五千三百六十四卢布⑭。

总之，恰克图条约的签订和买卖城的建立，表明了清朝政府在北疆的睦邻政策。在十八世纪中叶至十九世纪上半叶，买卖城在活跃中国边境人民的经济生活和促进中俄两国人民的经济和文化交流方面起了一定的作用。1850年（道光三十年），俄国在清朝政府允许下，开辟了塔尔巴哈台和伊犁市场，买卖城和恰克图的边境贸易便开始走向萧条。

① 斯拉德科夫斯基：《俄国各族人民同中国贸易经济关系史》（到1917年）。第134页，第132页。莫斯科，1974年版。
② 帕拉斯：《在俄国各省旅行记》。第3卷上。圣彼得堡，1788年。
③ A·米奇：《在东西伯利亚沿黑龙江旅行记》。第68页。圣彼得堡，1868年。
④⑤⑥⑦⑨帕拉斯：《在俄国各省旅行记》第3卷上，170—171、171、178、171、182—183页。
⑧ X·特鲁谢维奇：《俄国同中国的使团和贸易往来》。第230页。莫斯科，1882年。
⑩ A·科尔萨克：《俄中贸易关系历史统计评论》，第215页。喀山，1857年。
⑪ 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代中俄关系档案史料选编》，第305件。第360页至第361页。北京，1979年版。
⑫ 《高宗实录》，卷1389，页3—5。
⑬ 《中俄关系（1689—1916）》（正式文件），第25页。莫斯科，1958年版。
⑭ A·科尔萨克：《俄中贸易关系历史统计评论》，第67，第73，第97，第105，第137各页。

烈士暮年　壮心不已

——深切悼念商鸿逵先生

李世愉　　史志宏

1983年11月10日，我国著名明清史专家、我们敬爱的导师商鸿逵先生不幸病逝。我们为失去了一位和蔼可亲的良师而感到万分悲痛！

商先生是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我们曾有幸在他的指导下学习清史。几年来，先生对我们总是满腔热忱，循循善诱，我们做毕业论文，从选题到收集史料，先生都一一指点，不厌其烦。毕业后，先生依然关心着我们，时常询问我们的工作情况，鼓励我们多写文章。每当他听说我们写了文章发表时，总是感到无限的欢慰。每逢此刻，我们都从先生那发自内心的喜悦中得到巨大的鞭策和鼓舞。我们真盼望能在先生的指导下继续学习十年、二十年。万万没有想到，先生竟遽然长逝。近年来，先生一直不分昼夜，勤奋工作，以致积劳成疾，终于被脑溢血夺去了生命。当我们看到先生废寝忘食地工作，劝他保重时，他总是说："我宁愿死在书桌上，决不死在病床上"。就在他倒下的前几分钟，还完成了最后一篇文稿。先生是实践了自己的宏愿的，但是，这让我们活着的人在感情上无论如何也接受不了。

先生病故时，我们都不在他的身边，没能尽到一点做学生的义务，这将成为我们终身憾事！几天后，当我们从千里之外赶回，来到先生的卧室兼书房时，不禁触景伤情，黯然泪下。桌上摆着先生用的笔、翻开的书，玻璃板下压着他的工作计划，书架上堆着厚厚的《清会要》手稿，……一切宛如昨天，然而，那张先生坐了多年的旧藤椅仍摆在桌前，却再也不见先生的身影，不闻先生的声音了。如果不是考虑到师母的情绪和健康，我们真要失声痛哭一场。这一切，增加了我们对先生的怀念。他的风采，他的言谈，他那对事业乐观坚定，对科学孜孜以求的精神又都栩栩如生地展现在眼前。